

• 元代別集叢刊 •

袁楠集

上卷

(元) 袁楠 / 著 李軍 施賢明 張欣 / 校點

國家十一·五重點規劃項目
國家古籍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吉林出版集團
吉林文史出版社

●元代別集叢刊●

袁楠集

上卷

(元)袁楠／著 李軍 施賢明 張欣／校點

吉林出版集團—吉林文史出版社

本書為國家『十一五』出版重點規劃項目，受到國家古籍出版基金資助

本叢書為北京師範大學『九八五』重點科研項目《元代古籍集成》的子課題

項目主持人：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韓格平教授

《元代別集叢刊》編委會名單

(按姓氏筆劃)

叢書顧問：李修生 楊 鐮

叢書主編：李 軍

叢書編委：李 軍 李 鳴

邱居里 周少川

張文澍 鄧瑞全

韓格平 魏崇武

羅 超

《元代別集叢刊》序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陳垣先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發表，文章不僅對這一元史上極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課題作了充分研究，而且對元代文化進行了全面論述，他說：「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一〕}但是長期以來，對元代文化、文學的評價，由於種種原因，却仍有歧義。元史研究一直是很有成績的，關於元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的研究也有不少進展，但一些成果似也沒有及時為文學學科吸納。文學方面，元曲是顯學，其他文學形式的研究則相對薄弱。

元代詩文研究，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逐漸受到一些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一九八七年下半年，經所內同仁的討論，初步確定以元代文獻整理和元代文史研究作為研究重點。一九八八年十月，向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提出編纂《全元文》的立項申請，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專家評審組，經研究建議先進行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批准了《國內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錄》的立項。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我們對於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告一段落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正式批准《全元文》立項。在申請和討論立項的過程中，我所同仁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評審組的專家，有一個共同的擔心，人們有一個共同的估計，《全元文》的分量與其他同類總集比較不是最大，但是難度是最大的。當時白壽彝先生就說：「元史素稱專門之學，對語言、地理、疆域、民族及其他有關的文獻知識所需甚廣，而我們在人員、資料方面又比較缺乏，困難是不容低估的。」當時元人別集的整理本只有幾部。我們所同仁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開始編纂工作的，幸虧這項工作得到了元代歷史、文學學界的師友給予多方面的支持，幸虧我們的同仁在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工作（包括前後期工作共經歷了十八年），《全元文》才得以完成。還應該說明，這可能是本世紀初最後一項用剪刀加漿糊舊式工作方式完成的一部總集整理項目。

《全元文》出版後，我們進行了總結，檢查了誤收、重收、漏收的情況和收錄文集的情況，並且向同行師友收集了意見，初步議定下一步整理與研究的設想，一方面，準備編寫《全元文補正》，編輯成書，或出版《全元文》修訂本。當然，這需要一定的時日；一方面，準備整理元人別集，出版一套五十家或一百家的《元人別集叢書》，這同樣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元人別集與明清兩代比較是少得多，明人別集有近萬種，清人別集在五萬種以上，但也有可觀的數字。根據蕭啓慶先生估算，



元代儒戶可能有十萬餘戶^{〔三〕}。編籍在其他戶類的以及道釋也多有文化水平。可以說有條件編輯自己詩文成集的人，不在少數。元吳澄在《張仲默詩序》中說：「近世之為詩者不知其幾千百人也」^{〔三二〕}，也可以證明。編纂《全元文》過程中，我個人經眼的元人別集序、引、題、跋，約有一千二百篇左右，別集應在千種以上。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收錄六百七十餘種。《全元文》收錄文作者三千一百餘人，文章三萬三千餘篇，文集詩文集二百種以上。《全元文》出版後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楊鎌先生主編的《全元詩》也已完成。楊鎌先生主編的《全元詩》於二〇〇二年正式立項，實際工作已經二十多年了。《全元詩》共收錄詩作者五千二百餘人，詩作近十四萬首，其中收錄詩集在三百種以上。

說到元人別集的問題，這裏不能不回到一個老問題上，元代的起訖點和什麼人可以列為元人？宋濂修《元史》，起訖為元太祖元年至朱元璋建立明朝，即：一二〇六——一三六八年。韓儒林先生主編《元朝史》亦同。我們編纂《全元文》時，就《全元文》的收錄原則請教啓功先生。啓先生說：「從道理上講，凡生活於元代，在元代寫有文章的，都可以收錄。宋金兩朝的人，凡是人元，死於元朝的人，都可列為元人，如牟獻，前人習慣列為宋人，實為元人，有趙子昂的墓誌為證。」由元人明，在元朝寫有文章的，也可以收錄。我們當時為了與《全宋詩》、《全宋文》、《全金文獻》、《全明文》等總集的編纂工作協調，對於收錄的範圍自我設定了一個時限。現在看來，不一定合適。由於傳統的看法存在某些偏見，一些由宋金人元，由元人明的人，多不列為元人，對於這類情況，還需要研究。由於看法不同，數字就會有較明顯的不同。但無論怎樣計算，元人別集的數量應在三百種以上是毫無問題的。

斷代詩文總集的編纂完成，對於那一朝代文史研究的作用是大家公認的。但斷代詩文總集的編纂不能替代別集的整理，而況《全元文》、《全元詩》編纂時，別集的整理也剛剛起步，目前已整理的別集還是少數。不少出版界的朋友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有一些出版社已開始策劃這方面的項目，有的別集已有整理本出版，我們《全元文》編纂的參加者，也已參與了這方面工作，參與整理之後，更感覺到別集整理的迫切性。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吉林文史出版社與我們一起提出了編纂這套《元代別集叢刊》，並希望有一定規模。

從三百種以上的別集中，選出五十種有一定代表性的別集，經過整理編成一套叢書，是編纂這套書的初步的目標。只要求一定的代表性，不要求重要別集盡數收羅在內，因為有的集子不一定在這段時間內能夠整理出來，有的集子國內同仁已經出版整理本，我們《全元文》的參加者和合作的朋友僅就我們的能力所及完成這方面的部分工作。根據古籍整理工作的要求，我們要求收入叢書的每部別集均應選擇收錄較全、錯訛較少的版本作底本，做好輯佚、校點工作；每部書都有前言和附錄。前言介紹作者生平、思想、詩文成就，以及版本流傳情況；附錄收錄作者傳記、唱和作品、詩文評以及別集收藏情況等相關文獻。

古籍整理是一項相當艱苦的工作，高等院校教師一般都承擔着比較繁重的教學與科研任務，在目前的考評體系中，古籍整理

成果所占分值不高，因此，參加這項工作的老師們還是需要一點精神的。當然，這並不是降低對於我們的要求，叢書第一批書即將出版，我們期望國內同好的批評，更期望更廣泛的合作。元人別集的整理工作剛剛開始，我們相信這方面工作將逐步得到開展，以適應元代文化研究和當代文化建設的需要。

李修生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立冬日寫於懋堂

注釋

〔一〕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八《總論元文化》，一九二七年《燕京學報》；一九三四年勵耘書屋原刻本；《勵耘書屋叢刻》上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重印。

〔二〕蕭啓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臺灣新文豐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三〕《全元文》十四冊二六五頁，鳳凰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元代別集叢刊》編纂規劃及凡例

編纂規劃：

收錄範圍：本叢書收錄元代有代表性的、有影響的作家詩文集五十種。

收錄原則：以作者為單位，各自成冊；傳世兩種別集以上的作家詩文，均按一種成冊，歸於該作者名下；所收限於詩文作品，單行的詞集、曲集不收，但原集中已有的則收錄；筆記及經書註釋，原集中已有的也不收錄。

編輯原則：甲：尊重底本，基本依底本順序編排；乙：校點者根據文體自己編排；主要按甲類編排，個別特殊者可按乙類編排。

整理方式：本叢書的整理方式為校勘、標點、輯佚。

書名確定：統一以元人名加『集』字組成，如《張養浩集》。

凡例：

一、叢書每種別集採用錯訛最少、收錄較全的善本，足本為底本，以不同源流的他本為校本，以源流相同但經過前人校勘或修訂的版本為參校本。底本卷首原卷數保留，正文不分段。

二、一作者有兩種以上文集傳世者，按下列原則處理：

(一) 兩文集所收詩文大部分為不相同者按兩集收入，前集收全，後集重複者存目；三集、四集依此類推；

(二) 兩文集所收詩文大部分為相同者選較全者一集收入，此集無，他集有者附收於此集後；三集、四集依此類推。

三、底本確實有誤可據他本校改者，改正並出校記；底本、校本皆可通者出異文校記；底本不誤，他本誤者不出校記；無版本依據但確有疑義的可出待考校記。

四、原書之古今字、通假字，一般不作改動；異體字、俗體字、簡化字改為規範的繁體字；筆畫小誤、顯係誤刻或古人原不區分如『己、巳』者可徑改；凡原作者所用避諱字，一律仍舊，惟缺筆者補足；後人避本朝諱所改者，盡可能改回，並加說明。



五、遵照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國家技術監督局發佈的國家標準《標點符號用法》進行標點，其中書名用書名號「《》」，人名、地名、書名不用波浪綫或下橫綫；文中對話可明確括引的用冒號、引號，不明確的不用引號；引錄前人文章可明確括引的用引號，不明確或僅撮述大意的不用引號。

六、原集底本無、他本有之詩文，作為「補遺」置於底本正文後。

七、叢書要求對所收作者的集外詩文作輯佚，輯佚範圍包括總集、類書、碑誌和相關方志，佚詩佚文置於正文之後，以與全集相吻合的順序編排，且均需標註出處。

八、原集所有附錄保留，並適當增補，統一編排；附錄內容為：作者傳記材料、來往唱和詩文、相關詩文評論、有關序跋及書目題跋等。

九、每部書包含下列內容：

- (一) 總序
- (二) 凡例
- (三) 前言
- (四) 目錄
- (五) 正文
- (六) 輯佚
- (七) 附錄

前言

袁桷是元前期的著名文臣和詩文大家，是繼趙孟頫之後北上大都進入元廷的又一重要南士。在大都，袁桷參與了科舉制度的創建，並數次任考試官和讀卷官。上書《郊祀十議》，對於儒家祭祀禮儀的建立及實行多有貢獻。與貢奎、虞集、王士熙、馬祖常等館閣文臣詩歌唱和，開南北融合之盛世文風，是「元詩四大家」當之無愧的先導。

下面我們從「家世和師承」、「在朝與居鄉」、「著述及成就」三個方面對袁桷及《清容居士集》進行論述。

家世和師承

袁桷（一二六六一—一三二七），字伯長，號清容，晚年號見一居士，慶元鄞縣（今屬浙江）人。袁氏為四明望族，自十世祖袁元於北宋真宗年間遷浙定居以來，到袁桷這代，已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其間出現不少令袁氏晚輩引以自豪的人物。七世祖袁穀占籍開封試中進士，其弟袁穀更高中魁首，二人分別官至祥符縣丞、處州知州，俱遷徙四明。曾祖袁韶，受學於族祖袁覺、叔父袁變，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中進士。後韓侂胄當政，袁變時任太學正，被罷人偽學，袁韶亦因得罪蘇師旦被廢家居。寧宗嘉定元年（一二〇八），二人相繼回朝。七年，袁變子袁甫中進士第一，其時袁變官秘書監兼國子祭酒，袁韶官秘書丞兼樞密院檢詳。袁變、袁甫均為著名學者、陸學傳人，《宋元學案》專為立「絜齋學案」^{〔一〕}，袁變被稱為絜齋先生，諡正獻；袁甫諡正肅。

從世系上說，袁桷這支上溯至袁元，共經十一世，分別是袁元、袁田、袁寵、袁穀、袁昇、袁韶、袁似道、袁洪、袁桷^{〔二〕}。袁桷祖上，多有顯仕或封贈：袁謂贈少保，袁皋贈太保，袁昇贈太師、衛國公，袁韶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師、越國公，袁似道官中散大夫、嚴州守，入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會稽郡侯。袁洪宋末官建康通判，入元授朝列大夫、同知處州路總官府事，命下而卒，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三〕}。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有《再從姪瑛幼孤學道龍虎山自傷不能鞠摛述祖德以勉之》，敘其家世特詳，節引如下（小注為原文所有，括號中為筆者標注）：

煌煌玄胄，家越徙鄞。隱道閔躬，三世養真（袁元、袁田、袁寵）。是生祥符（袁穀），觀光績文。占籍浚儀（開封），佐邑孔

勤。粵有光祿，亦奉于越。聿魁開封（袁毅），老守于栝。少保（袁謂）恂恂，卑退靜閑。太保（袁皋）靈承，逃難乘筏。大韜輅明，閭里胥洽。篤生衛公（袁昇），喬柯茂豐。敦讓貽則，攝獄自公。絕蔓秉仁，千人著功。冥報氤氳，維垣錫崇。於赫少傅（袁韶），受學族祖。諱覺，有《書解》行於世，正獻亦師之。習經典謨，正獻（袁燮）同宇。正獻首科，少傅踵舉。正獻淳熙辛丑登第，少傅次舉于鄉。衛公夜夢神告曰：「汝子宜遲上南省。」甲辰，閩郡被黜。淳熙丁未中丙科，三歲學于正獻公。復師以研，繫我族父。昭穆會稽，非宗疇譜。同源迢迢，宴堂是敘。少傅挽正獻詩曰：「宴堂聯族子，講說後諸生。」相臣嫉忠，同黨同錮。韓侂胄擅權，正獻以太學正，罷入偽學，少傅以論蘇師旦亦廢。正學勃興，象山武夷。相繼登朝，奉常羽儀。維我少傅，抱其魁奇。曰經武有本，日用不疲。絕幣罷書，感勵孜孜。迺登東觀，迺佐宰司。歲為闕茂，正肅（袁甫，字廣微）冠廷。嘉定甲戌，正肅進士第一，正獻秘監兼祭酒。當是時，越公為秘丞兼樞密院檢詳。越公登第已二十八年。正獻休休，少傅繩繩。載史纂謨，致事以行。少傅作程，均贏紀經。翼翼京邑，十載救寧。

詩是寫給子姪輩的，在敘述家世的同时，誇耀祖德，勉勵晚輩繼承基業，光大門楣。

除袁氏外，四明尚有其他世家大族，如史氏、鄭氏。三家世代聯姻，遂形成累代簪纓世族的緊密網絡，如袁楠的母親來自史氏，袁楠的妻子來自鄭氏，袁楠姐妹有兩人嫁史家。如果說袁氏主要以學術名家的話，史、鄭兩家則是仕宦大族，先世出了不少權相。袁楠母親史氏，是史浩的曾孫女，史彌堅的孫女，史資之的女兒。史浩相宋孝宗，太師、保寧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諡忠定。彌堅兄彌遠，相寧宗、理宗，官太師、中書令。史彌堅官端明殿學士，當時其兄中書令柄國政，家居十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傅，諡忠宣。史資之的官朝請大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通奉大夫^四。袁楠妻子鄭氏，曾叔祖為鄭清之，南宋時官丞相，贈太師、魯國公。其兄為鄭氏曾祖^五。這樣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網絡，使袁楠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這份家族榮耀，隨著南宋的滅亡，也不免成為他的精神負擔，每每在談及宋末史事時瞻顧左右，吞吞吐吐。

袁楠生於錢塘，母親生下他僅七日，就因體弱而亡，袁楠由外祖母張氏撫育長大。幼年的袁楠，每年兩次到外祖家去，晚年所寫《憶昔二首》，對此曾有回憶，其二云：

外家甘盤宅，門閤誠煒煌。高懸金碧榜，中有袞繡堂。珠璣左右侍，絲竹儼成行。幼不識慈顏，到彼心徬徨。每歲兩過之，嚴訓具有方。青梁病居養，久爾生情荒。七歲誦詩書，十齡學詞章。駁尋志學歲，折節師老蒼。紀事法班馬，冥心契義黃。謬與時彥交，寶書閱琳琅。今茲乞南歸，往事增慨慷。興懷陶與蘇，秉筆追耿光。凱風有遺思，願言繼餘芳^六。

詩寫於袁楠六十歲從大都南歸時。數十年過去，外祖家給他的印象仍是那麼清晰，其中所描繪的「幼不識慈顏，到彼心徬徨」的心理感受，非真實體驗者所不能道。

袁桷幼穎悟，雖生富貴之家，仍為學清苦，讀書每至達旦。稍長，其父袁洪延師教子，四明不少耆舊碩儒，文章大家成為袁桷的老師。袁桷學問淵博，雖有家族熏陶，其祖上不少人在朝中擔任與撰述有關的職務，但他自己的師承仍是最重要的因素。集中有《先君子蚤承師友晚固艱貞習益之訓傳於過庭述師友淵源錄》一文，大略列數了袁桷的師執或亦師亦友者三十六人，其中下列幾人比較重要：

王先生應麟，兄弟中博學宏詞科，為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咸淳詔冊辭命，皆先生所作。著書有《春秋攷》、《逸詩攷》、《古易攷》、《通鑑義例攷》、《困學紀聞》、《玉海》一百卷、文集一百卷。先子命桷受業門下十年。

胡三省，天台人，寶祐進士。賈相館之，釋《通鑑》三十年，兵難藁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日手抄《定註》。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定註》今在家。

戴表元，辛未進士。善論策，失仕歸里，力從諸先生。能古文，為金陵教授，時與之同官。家貧，衣食喪葬咸賙之。後留塾中，有《榆林集》五十卷。

程鉅夫，舊名文海，郢州人，今居建昌。善鑒裁。為侍御史，時奉詔徵江南遺逸，首薦先子，以疾辭。所薦士皆知名，多至大官，今為翰林學士承旨。

舒岳祥，台州寧海人。七歲能作古文，弱冠謁吳子良吏部，大奇之。吳學于陳者卿舍人，舍人學于葉適正則。以師道自任，好譏侮。晚歲詩益工。官慶元時與之遊，後作書，俾桷往事之。

史蒙卿，乙丑進士。拙程文，默誦五經。其學喜奇說，禮部尚書王公多傳授之，卒以奇不合于王公^{〔七〕}。

王應麟，胡三省、戴表元、舒岳祥，均為四明當地人或寓居四明。袁桷父袁洪，曾廣泛延請這些著名學者或詩文大家，教授袁氏子弟，袁桷很小就開始從這些大家學習。袁桷自己的詩文及他人文獻中對其師承有不少記載：

四明王厚齋尚書好博學，每以小冊納袖中入秘府，凡見書籍異聞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學紀聞》，可謂遺訓後學者矣。國初袁伯長、孔明達、史果齋，嘗登門請教者惟三人焉。明達諱昭孫，時為慶元儒學教授，時伯長方十二年，不過隨衆習句讀已耳^{〔八〕}。

王應麟（一二二三—一二九六），以諳悉典章制度為長。袁桷十二歲從師，在其門下十年，剛開始可能「不過隨衆習句讀」，隨著年齡的增長，乃師博學善錄、詳悉典制的特長，不會不對他產生影響。袁桷後來在朝中就禮儀問題上書，「禮官推其博」^{〔九〕}，即為其證。

戴表元（一二四四—一三一〇），與袁洪很早就为好友。南宋咸淳七年（一二七一），戴表元中進士後，在建康任教授，時袁洪

通判建康。二人朝夕往還，戴氏家貧，「洪每周之」¹¹⁰，「復以不肖孤托於先生，誘之迪之，獲不失其身」¹¹¹。戴氏是文章大家，袁桷從其學是在至元十五年，「戊寅之秋，愚駭無肖。承先子之命，以奉灑掃」¹¹²，時袁桷十三歲。

胡三省（一二三〇—一三〇二）影響袁桷主要是在史學領域。胡氏在宋末已完成《資治通鑑》的音注，但因戰亂原稿喪失，在袁洪家館居數年完成二稿。袁桷因家族關係，本身就比較熟悉宋代史事，家富藏書，又接聞耆舊遺老之言談，確有撰述宋史之志。胡三省矢志於史書的撰述，應該也是袁桷立志修史的一個因素。

舒岳祥（一二一七—一三〇一）以詩文名世，晚年寓居四明，袁桷遵父命師事之，從其習詞章。

程鉅夫，在南宋首都臨安陷落之前就以質子身份北上大都。在忽必烈身邊，他經常進言，提出不少經營南土、使用南士的建議。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忽必烈派他南下，搜羅南宋遺老。第二年，他薦舉的趙孟頫等二十多位南人隨其北上，進入元政權。袁洪也在被薦之列，不過並未成行，但由此可知程鉅夫是認識他的。回朝若干年後，程鉅夫又舉薦了袁桷。

史蒙卿，即《至正直記》裏提到的「史果齋」。他與袁桷一樣，曾在王應麟門下學習，是四明當地的理學家，論學以朱子之說為主。史蒙卿為袁桷外家舅氏，生前曾囑袁桷為其作墓誌銘，《宋元學案》為之立有「靜清學案」（史號靜清）¹¹³。

廣泛而多面的學習，使得袁桷學問日進，詞章練達。日後入朝為官，袁桷分別在典制、修史和文學方面展示出其過人才華。除了家族影響和個人勤奮外，廣泛拜師，師從名家，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在朝與居鄉

袁桷較早即走上仕途。年未三十，南臺御史王及翁，薦舉他擔任麗澤書院山長。戴表元《送袁伯長赴麗澤序》云：「余故人王及翁御史無恙，其介紹而請焉。元貞乙未春十日，剡源戴表元序。」¹¹⁴王及翁名龍澤，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起擔任江南行臺監察御史¹¹⁵。袁桷赴任是在元貞元年（一二九五），薦舉應早於此年。但袁桷接到任命並未馬上成行，為此戴表元特意寫了上文促其儘早赴任，文云：「今袁君伯長，與余同郡同業，懷麗澤之牒，當行已久而不肯決，曰：『為長於麗澤，師儒也。其任異時與郡博士正等，而東萊公之闕里也，吾趨超焉。』」余曰：「固也。然吾伯長當學為其事而求無愧者也，謙而非偽也。東萊公之學，又史、袁、沈諸公之所同者也。必不可已，則當且為而又且學之者也。」伯長持身有士行，居家有子道，天資高，文章妙，博聞廣記，尤精於史學，近復貫穿經術。他如琴書醫藥諸藝，深得其理。發多君子，至必皆願從之遊者。」在戴表元的勸說下，袁桷於當年赴任¹¹⁶。袁桷任麗澤山長期間，柳貫曾從其學。柳後來在《祭袁侍講文》中對此有描述：「貫昔踰冠，承公教指。麗澤堂筵，句章客寄。親仁觀德，賴發蒙鄙。」¹¹⁷麗澤書院在婺州。書院為一級教育機構，相當於學校，山長相當於校長。但書院與官方的地方

儒學如路學、州學、縣學又有區別，地方儒學教授有官品，山長則不入品。故此有文章認為，袁桷遲遲不肯赴麗澤之任，是因山長沒有品級：「按理說，袁桷不會有為宋朝守節的想法，即使他的父親也沒能做到這一點；很可能他對這個職務還不太滿意，因為它是沒有品級的。」^{〔一〕}不會為宋朝守節，這一點不言而喻；對沒有品級的職務不太滿意，也似乎言之成理。但筆者以為，此事還應有其更深層的原因，這需要聯係當時南土對新朝的態度來分析。南宋被元朝所滅，南方士人如喪考妣，視同亡天下，因此對新朝持強烈的反對態度。其強烈程度，為北方同樣由金人元的士人所遠遠不及，這在林景熙、鄭思肖、謝翱等亡宋遺民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隨著時間的逝去，特別是忽必烈穩定南方經濟、發展生產、較寬鬆的文化政策及起用南土的舉措，使南人逐漸開始消除對抗心理。宋亡十年後，程鉅夫奉世祖命下江南搜訪遺佚，隨之趙孟頫等人北上，這無疑起到了一個很有有效的示範作用。十餘年後到成宗大德年間，南方士人人仕新朝已成常態，如戴表元任信州儒學教授、虞集任大都儒學教授等。袁桷的被薦麗澤，正處於兩個時間段之間，這個時間點比較敏感。分析他此時的心態，於服務新朝，既在趙孟頫等人北上之後，他當然不會有多大的排斥心理；但在大多數南土尚未有行動之前，他很可能也會存在一定的思想壓力或心理負擔。筆者以為，這才應該是他「趨起未行」的真正原因。《康熙鄞縣誌》的《袁桷傳》有一段話，似乎可為此佐證，傳云：「（袁桷）上王深寧書有云：「久知我輩，固當投之濁流；靖念斯文，詎宜束之高閣！」則其愧仕之心，亦自見乎辭矣。」^{〔二〕}深寧指王應麟，袁桷曾在其門下學習十年。王應麟卒於一二九六年，即袁桷赴麗澤任的第二年。袁桷上書王應麟的這幾句話，修志者解釋為「愧仕之心」，則恰可反證，袁桷當初對「仕」是有猶豫的，這猶豫很可能來自擔憂老師們對他行為的不贊成。所以，當同為師執的戴表元寫了那篇序後，袁桷才扔掉包袱，很快赴任。

袁桷在山長任上三年期滿，大德初回到家鄉。此後不久，袁桷家裏相繼有兩位親人離世，其間相隔僅八日。大德二年（一二九八）正月，袁桷妻鄭氏生下一女。二月八日，因產後身體虛弱，命在旦夕，正在杭州主持外甥史氏婚姻的袁桷趕回家裏，則已不及。接著八天後，父親袁洪也去世^{〔三〕}。大德五年，袁桷丁憂期滿，經閭復、程鉅夫、王構舉薦，朝廷正式任命袁桷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四〕}。六年，袁桷赴大都任職，從此進入元廷，開始了長達近二十年的在朝生涯。

袁桷在朝，分別經歷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五個皇帝。成宗大德六年，始入朝任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七年，升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十年秩滿歸鄉；逾年再入翰林院，或任修撰，三年後即武宗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再次秩滿歸鄉；鄉居三四年，仁宗皇慶二年（一三二三）春，再至大都，官翰林待制；延祐三年（一三一六），任滿後仍以原職留任；五年，升集賢院直學士；七年初，由集賢直學士歸鄉。英宗至治元年（一三三一）回京，仍任原職；二年，任翰林直學士；三年，因拜住薦，任翰林侍講學士；泰定帝泰定元年（一三三四），辭官歸里。此後一直鄉居在家。泰定三年八月，曾赴杭州任江浙行省鄉試考官，不久即因長子去世而回鄉。四年八月，袁桷卒^{〔五〕}。

從袁桷的仕宦經歷看，可謂一路平穩順暢，沒有大起，也沒有大落。成宗、武宗時期，處於剛起步階段，速度較慢，任滿後總要停滯一段時間才能再入朝，升遷不快。自仁宗朝開始，他似乎駛上了快車道，一路快速前進，在英宗朝達到宦途的頂點。如果不是英宗和拜住的被弑，他或許能夠成就自己修《宋史》的志願，在朝政上也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從這一點上來說，袁桷是不幸的。但他又是萬幸的，作為南方士人，剛剛三十歲就得到入仕機會，服務天子身邊近二十年，而沒受到任何彈劾、貶謫及非議，也沒外放，並一路上升到二品的高位，這在有四等人制度的元朝，尤其在中期以前，是非常不容易的。作為不同時期南方文人的代表，他雖然不像在他之前的趙孟頫的品級高（趙是從一品），也不像在他之後的虞集在大都文壇的影響大，但同樣也沒有像趙、虞二人因才華過人、皇帝垂青，而遭致嫉妒、非議甚至攻訐，以致或求外放，或屢屢辯白。袁桷在朝中所擔任的，本就比较清閑的文字之職，皇帝的詔令、贈諡、禮文及公卿大臣的碑版，都是由他這樣的手筆來完成。《清容居士集》中，這樣的公文佔據了相當大的篇幅。但又不僅於此，修史、修實錄，也是他們這些翰林們的職責。完成一代之史，是袁桷的夢想，他曾一度非常接近那個目標。另外，官至侍講學士，可以將儒家思想向皇帝宣講，這無疑也是實現儒生政治理想的最好途徑。這一切本來是有作為的，或者說，袁桷本可以在政治上和學術上取得比現在大得多的成就，本可以在元代歷史上佔據更高的位置。然而，隨著一場宮廷政變，他在那個仕途的最高處戛然而止了腳步。這一切沒有再實現的機會了，他也離開了朝廷，回到故鄉，頤養天年。

袁桷在朝中最主要的貢獻，是在典章制度的建構上，一個是郊祀制度，一個是科舉制度。

成宗大德年間初建南郊，袁桷一人朝就上給太常院《郊祀十議》，對於郊祀制度的建立，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其《進郊祀十議狀》云：

夫天無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或以變禮者為正。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復疑焉。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古經之可見者也。《周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薦粟，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禮成于周公，未之有改，增羣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猶至日之不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

書上，史載「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二四〕}。大德十年（一三〇六），朝廷有建圜丘之議，袁桷參預其中。仁宗去世，原來世祖皇帝時所建帝廟七室已滿，「英皇親行祫享之禮，始議增廣廟制，乃作新廟為十五室」，袁桷「亦預其議」^{〔二五〕}。

仁宗是一個傾心漢文化的皇帝。上任之初，國策有比較大的改變，長期議而不決的科舉制度，在仁宗朝得到了切實的實行。

袁楠正逢其時，參與並制定了一系列有關科舉考試制度的條文，並在首科考試中擔任廷試讀卷官。延祐四年（一三二七），任大都鄉試考官，出大都鄉試策問試題。五年，復任廷試讀卷官，上進士策問考題。英宗至治元年（一三二一），任會試考官。泰定帝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再出進士策問考題。在朝中，袁楠兩任廷試讀卷官，三任鄉試、會試考官。特別在制度建立之初，「貢舉舊法，時人無能知者，有司率諮于公而後行。及廷試，公為讀卷官一，會試考官一，鄉試考官二，取文務求實學，士論咸服」^{二六}。可以說，對於元代科舉考試制度的建立和具體的實行，袁楠都是有貢獻的。

在朝中，袁楠曾奉詔修成宗、武宗、仁宗三朝《實錄》。英宗實行新政，丞相拜住「獨秉國鈞，作新憲度，號令宣布」，袁楠都有推動之功。拜住亦非常看重袁楠，「銳欲撰述遼、宋、金史，責成于公。公亦奮然自任，條具凡例及所當用典冊陳之，是皆本諸故家之所聞見，習於師友之所討論，非牽合剽襲、漫焉以趨時好而已」^{二七}。英宗、拜住對袁楠有知遇之恩，袁楠亦傾力相助，如果不是「南坡之變」，這或許可以成就君臣銳意改革、南士大展身手的一段佳話。英宗、拜住被弑，袁楠失去了這樣的機會，因此他的仕宦生涯，除了上面提到的制度建設，在其他政治方面就乏善可陳了。這不能不說是袁楠的個人悲劇，也折射出南方士人進入元廷所面臨的政治上的窘境。

袁楠進入大都後，一直任職中央政府，沒有擔任過地方官職。在朝中的二十多年，雖然政治上未能如他自己理想那樣有多大的作為，在大都文壇上，他卻是一個承前啓後的重要人物。元代最重要的文壇在大都，如果我們把元代詩文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的話^{二八}，前期的大都文壇以北方為主，中期是南北文風融合階段，後期因中原陸路隔絕，南北文壇各自發展。在後兩個時期，大都文壇均以南方為主。袁楠在大都的文學活動，處於中期的前一階段。這一時期活躍於大都文壇的南方人，在他之前有趙孟頫，與他同時而成名在他之後的有虞集為代表的「四大家」。受到世祖、仁宗寵遇的趙孟頫，作為南方人，在大都文壇尚是單兵活動，而在眷遇虞集、揭傒斯的文宗和順帝前期，南方文人則是一個羣體。袁楠就正處於二者之間，他完成了從趙孟頫到虞集的過渡，開啓了大都文壇南方士人形成羣體的肇端。

袁楠在文壇上的地位，不僅僅決定於他的官階，更重要的是他的豐富的創作實績。關於袁楠的著述及詩文創作情況，我們放在下一節論述。

袁楠在每次宦期屆滿後，多歸里家居，等待下一個任命。大德十年、至大二年、延祐七年，他分別回鄉一年、四年、一年，直到泰定元年辭官，四年去世。可以看出，袁楠入仕之後，在鄉的時間很短，不到十年，但如果加上入仕之前的時間，自成年二十歲起算，除去任職麗澤書院山長的三年，則有二十二年的時間，這也足以讓他在家鄉有所作為了。

袁楠居鄉期間所作的最大貢獻，是編纂了《延祐四明志》。晚年又有《易說》、《春秋說》的著述，但很可惜，這兩部書未能全部

完成，所以沒有流傳下來。著述我們放在下一節論述，此從略。

除此之外，袁桷居鄉期間主要做了下面幾件事：為鄉人及地方官員寫了不少碑版文字，作為曾任職史館和翰林院屬官的他，這是推脫不掉的義務，應行省之邀赴杭州任江浙鄉試考官，後因長子突然喪亡而中止；刊行老師們的遺著，為此他頗費心力，或為募錢寫疏，或為梓行作序。至大三年（一三一〇）戴表元卒，此後袁桷曾有刻集之舉，他寫有《戴先生刻遺文疏》，就是為募集刊刻資金而作。王應麟的《困學紀聞》，係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廉訪僉事孫楫命刊^{二九}，刊刻前，袁桷為之寫序。

著述及成就

袁桷一生著述，橫跨經、史、集三個部類，數量比較龐大。據蘇天爵《袁文清公墓誌銘》載：「公有《易說》若干卷，《春秋說》若干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易說》、《春秋說》，為其經部著作，今已不傳。所幸的是，在《清容居士集》中，有經義方面的問答文章，借此可略窺袁桷在經學領域的思想及觀點。五十卷的《清容居士集》，是袁桷的詩文別集。另外他還有史部著作《延祐四明志》，這是在他居鄉期間應總管馬澤之請而纂述的，因女兒去世中途退出，王應麟之孫王厚孫繼其業而纂成。

《清容居士集》是元代重要的詩文別集，歷來受到重視。袁桷曾讀書吳興，有清容書院，故以名集。存世有元刊五十卷本。蘇天爵所撰《袁文清公墓誌銘》言袁桷有集五十卷，與今傳《清容居士集》卷數相合，可確定其詩文基本未有散佚，現存乃元刊舊本。傳世的元刻本國家圖書館有藏，字體秀整雅潤，趙體風格，正文遇皇帝稱呼或「似」、「洪」等家諱，多有跳行空格及缺筆，以明所尊。無序跋及附錄，不能詳知其刊刻年代和刊刻者。民國期間編刊《四部叢刊》，據元刻本影印收入。國圖藏及四部叢刊這兩部元刻本均有補刻，卷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七—三十九、四十七—五十為配補，字為歐體風格，版式與元版相同^{三〇}。此集至今未見有明代刻本流傳。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據兩淮馬裕家藏本收錄。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上海郁松年輯刊《宜稼堂叢書》，收入此集。郁氏家藏元刻本，中有王肆跋，稱其於永樂十四年（一四一六）冬得此集，「蟲鼠損傷，卷目失次。乃於暇日補治，序其先後之目，故得以全其美」^{三一}。叢書據元刻本印行，郁氏又得毛生甫從錢大昕精校抄本傳寫的抄本據以校勘，因撰札記一卷，附之以行。宜稼堂本文所收詩文與元刻本同，正文後有王肆跋、王瓚撰《諡議》、蘇天爵撰《墓誌銘》、郁松年撰《札記序》和郁氏《重刻清容居士集札記》。民國時《叢書集成初編》及《四部備要》均據宜稼堂本收入，排印出版。傳世尚有若干清抄本，國圖藏的兩部均有附錄一卷，所收即為《諡議》和《墓誌銘》。

《清容居士集》卷一、卷二為賦騷辭，卷三至卷十六為詩，卷十七至卷五十為文，其中卷四十五為題畫作品，有詩有文。全集共收詩八百六十九題一千四百六十二首，文七百九十七篇，附他人詩一首。